

## 「全球化」脈絡下的文化、宗教變遷 ——再思認識中國文化、宗教之當代意義

周惠賢（本社副社長）

### 前言

「全球化」自上一世紀末開始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其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但最為人所關注的多是經濟層面，即指資本主義如何借助當今發展迅速的資訊網絡，不斷跨越民族疆界，將產品信息及產品，從一個國家或區域擴展到全球，使全球形成一個「大市場」。現在較為多人所擔憂的經濟問題是，跨國大集團在製造及推銷其產品時，如何將一些弱勢生產者、商品及群體邊緣化，甚至淘汰。然而，「全球化」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在商品輸出時，同時將商品所屬的地區文化輸出，如麥當奴文化象徵的快餐文化和美國文化便是一例；因此全球化亦涉及文化、甚至宗教、政治、生態多個層面的複雜問題。本文將集中討論，究竟全球化為我們的文化、宗教處境帶來了怎樣的改變，藉此讓讀者了解到，處於於全球化的文化脈絡中，認識中國文化與宗教是有其時代價值與意義的。

### 從全球化 (Globalization) 到地方化 (Localization)

全球化對地方文化的影響，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理解。就消極角度來說，Schiller 從傳媒力量與個體的有

限自主來推論全球化只會為當代帶來單一文明。Schiller 指出生活於全球化處境下的閱聽人，在接受媒體集團發放資訊時，只是處於傳播過程的末端，沒有參與文化生產過程。與此同時，Schiller 認為生活在全球化下的閱聽人是活於一個「整套文化包裹」(total cultural package) 裏，如美國華納集團所擁有的有線電視、電影、唱片、圖書出版、主題遊樂園、購物中心等大眾文化資源便是一例，使閱聽人難以逃脫媒體集團的影響。生活於全球化下的閱聽人，只能在既有的內容中作對抗，沒有實質的「自主解讀」能力。<sup>1</sup> 日本學者福山更悲觀地認為，歷史已經終結，未來民族國家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社會。在這一股全球化潮流下，表現出來的不是世界「大同」的美好世界，而是文化霸權的產生。<sup>2</sup>

就積極角度來說，全球化時代亦是世界處於後殖民的時代，這亦令世界走向多元化的格局。二次大戰以後，殖民地紛紛獨立，殖民地獨立後，其中要處理的是確認自己的獨立身份及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如馬來西亞為強調其民族統一性，堅持以馬來語為國語；一些亞洲學者為了強調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亦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念等；後殖民世界顯然為多元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至於在全球化的時代，雖然強勢文化不斷輸出國際市場（自冷戰後，主要是西方的美國文化）、衝擊弱勢的地方文化，但是非西方國家深恐本身的民族文化會被吞噬消滅，亦積極建構及保存其地方特殊性（uniqueness），以抗衡全球性的跨國同質化過程。

與此同時，非西方國家發現地方的民族文化本身亦是一種經濟力量，可推進國際市場，這從中國餐、印度民族服裝、華人所拍攝的「臥虎藏龍」於西方世界受注視便可見一斑，它們的賣點正就是其特殊性。越是全球化，各地依據本身地方特色，並藉由全球性的媒體傳銷網絡行銷其地方意象及產品特色，而獲得全球性的效益。<sup>3</sup>亦正因為這一點，文化隔絕在全球化時代是不可行的。地方民族文化對全球文化不斷地篩選、揚棄，從而融合，使本身的民族文化成為一種既包涵傳統，又包涵創新的文化，以迎合地方、全球需要。因此，不論站在文化保存或國際市場角度而言，宏揚地方的民族文化漸為非西方國家所重視，並且推動地方的民族文化將是未來的趨勢，人們將活於「全球化—地方文化」的互動關係中。

從上看來，當我們今天面對「市場化」、「全球化」的歷史挑戰時，同一時間我們聽到的亦是文化的「特殊化」、「地方化」的訴求，驅使我們再次思考我們如何看待本土文化及本身的民族文化。有關香港本土文化的探討，因此篇幅有限，暫且擱下不論。就我們的民族文化（中國文化）而言，它是經過了幾千年的積累而發展起來的，它蘊藏著本身民族的經驗與智慧，不應隨便被揚棄。然而，在步伐急促的現代社會，我們還未看到本身民族文化的智慧，不是跟隨廿世紀部份學者，將中國（以及西方）文化的討論置放「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格局來理解，即中國文化是「傳統」、是「落後」的；西方文化是「現代」、「先進」的；就是跟隨上兩個世紀部份宣教士的立場，也誤會中國文化中有些內容與基督教信仰不協調。昔日，我們因為信仰、教育、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使然，我們未能深入了解中國文化，但面對因回應全球化而引起地方的民族文化的反彈，我們就不能不重新認識中國文化，以回應我們當前所身處的社會及國際的新文化形勢。

## 從中國傳統宗教改造到新興宗教興起

從宗教角度來說，知識傳播的全球化（特別是近代崛起的宗教研究）造就了中國宗教的改造。就以道教為例，近代道教學者的研究都著力將道教文化中的仙道學說與實踐的科學性呈現出來，並且還將之與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與倫理學黏合，這大大增進了道教與當代科學和人文科學兩大思潮對話與融攝，為道教加添了科學與人文內涵。

此外，全球化亦幫助道教站出去、面向世界。由於道教非為一傳播宗教（missionary religion），極少向外傳揚，只在家族、村落這等小型社會單位中流傳。在全球化處境中，地方宗教獲得注視，這使道教不再圍限於中國小農社會中發展，反而跨出中國本土門檻，走進西方世界的宗教群體、學圈及文化當中，這有助道教文化在更廣闊的範圍來作自我表述、有助其自身傳統的豐富及發展。

全球化除了令中國宗教得以改造、面向世界外，亦造就另一宗教現象出現——新興宗教的興起。當十九世紀社會進入現代化模式時，部份社會學家預言社會將漸趨「世俗化」（secularization），即宗教於「工具理性」主導的社會，勢會失去其魅力，其社會地位及功能亦漸次萎縮，<sup>4</sup>甚至消失。然而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宗教發展並不如上兩個世紀的社會學家所言，反而出現了中西宗教融合的「新興宗教」。

萌芽期或是初期的新興宗教現象始見於西方（特別是美國），主要是將西方理性主義跟東方宗教所強調的靈性提昇進行融合與交織。西方的學者 Stark<sup>5</sup> 及 Hamilton<sup>6</sup> 指出，當代新興宗教並非全「新」的，它們幾乎是以一特定的傳統宗教為基礎，一是與其他宗教傳統結合，又或是注入其教團領袖的創意而成為一「新興宗教」，並與其存在的社會文化及傳統宗教保持張力。<sup>7</sup> Karla Poewe 尤其指出，<sup>8</sup> 當代許多新興宗教都是結合了西方的，並且同時具有因地制宜的特質。

新興宗教的發展與「全球化—地方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因著全球資訊網絡高速發展，資訊的交換與流通比過往更快、更直接。Karla Poewe 指出，<sup>9</sup> 活於資訊

爆炸年代的人有一特色，就是對異質文化採取開放並包容的態度；新興宗教成員就是一群自由人，往來於各種不同宗教文化裏面，集其大成。這些宗教自由人，因著其所身處的地方文化作自我反省，又或是適應當地環境變遷的壓力，發展具有地域性的教義與組織。

值得關注的是，新興宗教現象不再是西方的宗教現象。八〇年代，新興宗教文化的傳播出現了一個轉向，於美國發展成型的新興宗教現象，挾著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優勢勢力，將經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東方文化思想如印度、日本、中國，再度傳回東方世界的國家中，為其靈性觀既有傳統東方宗教文化的色彩，又有融合西方文化的新觀念與新視野。現在在亞洲地區比較流行的新興宗教包括佛教系的日蓮正宗及創價學會。

上述對當代宗教變遷所作的概略描述，我們可以看到在二十一世紀越來越小的「地球村」中，各種宗教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將日益加快，宗教的競爭將激化，各宗教都無可避免地既面對其他傳統宗教改造及新興宗教的挑戰。倘若我們像上兩、三個世紀前的西方宣教士般，將中國宗教描述為「迷信」，一方面忽略了視近代中國宗教的變更，無疑徒添了宗教間的誤會與矛盾；另一方面，看不到中國宗教（東方宗教亦然）所蘊含的宗教智慧，為甚麼它（它們）與西方宗教或文化結合後能滿足當代人的宗教及靈性需要；這疑失卻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正當對話，及失去豐富自身宗教傳統以回應當代人的機會。

## 總結

全球化將現代化所創造的非此即彼二元局面打破，隨之而來的是多元化局面；並且因著人類頻繁交往，我們以往對某一文化、宗教所作的「定型」(stereotype)理解，不斷受到挑戰。處於這樣形勢下，我們必須至少對本身民族的文化、宗教傳統有深入認識，以致我們更能對它們作出篩選、揚棄或融合，<sup>10</sup>而非只以「全面揚棄—全面採納」兩個極端態度來對待圍繞我們身邊的中國文化及宗教。

<sup>1</sup> Herbert I. Schiller,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8-54.

<sup>2</sup>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sup>3</sup> 有關全球化與地方文化的互動關係，參David Morley and Kevin Robins, *Spaces of Identity: Global Media, Electronic Landscapes & Cultural Boundaries* (N.Y.: Routledge, 1995)。

<sup>4</sup>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by H.H. Gerth &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sup>5</sup> Rodney Stark, "How New Religion Succeed: A Theoretical Model" in *The Future of New Religious Movement*, eds., David G. Bromley and Philip E. Hammond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29.

<sup>6</sup> Malcolm B. Hamilton, "Secularisa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7), 165-182.

<sup>7</sup> Rodney Stark, "How New Religion Succeed: A Theoretical Model" in *The Future of New Religious Movement*, eds., David G. Bromley and Philip E. Hammond, 11-29.

<sup>8</sup> Irving Hexham, and Karla Poewe, *New Religions as Global Cultures* (Boulder, Col.: Westview Press, 1997).

<sup>9</sup> 同上，頁43。

<sup>10</sup> 有關不同文化的相遇、對話、相融的討論，可參考近代詮釋學的理論，參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 revised by Joe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art II,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Hermeneutic Experience," pp. 265-307 及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 & trans.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